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BROAD: A COLLECTION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French Sinology: Past and Present

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法]戴仁○编

耿昇○译

※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系列研究

法国中国学的 历史与现状

French Sinology:

Past and Present

◎ [法] 戴仁 编 耿昇 译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法]戴仁编,耿昇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2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朱政惠主编)

ISBN 978-7-5326-3001-1

I. ①法... II. ①戴... ②耿... III. ①汉学—研究—法国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0037 号

责任编辑 解永健

装帧设计 汪 溪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7.75 插页 1 字数 805 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001-1/K·683

定价:1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5032807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其研究取向与研究

方法有很大的相通性。

海外中国学包容宽泛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单独穷尽其研究,所以对它的探讨,必须有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如果每个学科都能根据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深入对其相关领域的探讨,那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重要突破。

我们之所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只是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较长,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缘起及其主要成就,都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历史等人文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还是“二战”后的现代中国学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集中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探讨,尔后社会科学逐步介入,转入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态势。所以从历史学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尊重,也是针对性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手段。诚然,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仅仅从一个学科来把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渊博学识才有可能应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局势和研究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探索工作更具魅力而富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这项工作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翻译丛书已有不少,各家都有自己的用心和重点。参考诸家丛书发展特色,本丛书将把重点放在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上,包括对象国汉学史、中国学发展史的梳理、回顾和总结,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国学机构成就的探析和解读;当然,为了了解当前国际汉学发展前沿与思潮动态,也将重点翻译和推出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学术名著,包括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为后人留存史料、保持珍贵历史记忆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将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还将努力推出一些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和批判人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熄热情,衷心期望我们的努力成为通往成功之径的小小铺路石。

编者

2008年3月

译者的话

本书的主要篇幅,是译者于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内容。这次经过对原译文的全面校订修改,又增补新译文约20余万字,集成本书出版,以飨我国学术界。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国外中国学”或“国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此前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海外中国学重要著作多有中译本问世,以“中国学”为中心的国内外学术讨论会频频举办,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中的“中国学”科研教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创建,甚至许多中国学生也专程赴国外去学习和研究海外中国学,外国许多著名中国学家都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广泛、频繁而又直接的联系。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视野先后传入了中国,中国学术界已有的老学科获得了新发展,新学科也不不断地被催生,许多“禁区”被突破,许多空白被填补,一代新型科研人才已经脱颖而出,并且已经在扛大梁。总之,由于海外中国学科研成果的引入,中国传统上的那种“独居小楼成一统”的“十三经注疏式”的科研,已经完全不能再大行其道了。现在,只注意国内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关注国外同行们的研究。学术本来就是天下之公器,它只有正谬、深浅、新旧、偏颇与公允之分,绝无国家、族群和地域之别。在现今的环境中,任何学问都变成国际性的了。

不容讳言,现在国内的“中国学”研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赶时髦、凑热闹的“虚假兴旺”局面。其主要表现是不从原著入手,而是多渠道反复转引,不熟悉原著而夸夸其谈地作“评述”。因为,任何“评述”也只能是在大量地仔细阅读原著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有的学者一篇短文之后,罗列了一大批国外同行的“参考书目”,但其中有一大半书,我们质疑他是否真正读过,甚至是否见过。有的学者,在引用译著时不提译本,而以“内行”自居,只注明外文版本,因而出现了“外文版本,

中译本页数”的怪现象。不作完整的翻译而作叙述,不免会造成先入为主和各取所需的评说,这也是对翻译者工作的极大不尊重。

在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中,法国占据着一种特殊地位。“二战”之后,美国凭借着自己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甚至是从整个东方乃至中国,以优惠条件延揽了大批中国学家,在本土上也培育了一批成果不凡的人才。日本凭借着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充分利用了他们大量收藏并容易阅读中文典籍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国学研究(其实,日本“中国学”的很大一部分与其“国学”是很难区分的)发展较快。在现今的国际中国学术界,美、日两国独占鳌头。但在历史上,中国学研究最早起源于欧洲几个殖民地和航海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但法国很快就成了西方中国学中的佼佼者,而且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法国是首先向中国派遣“科学传教区”的国家,也是首先使中国学登入大学殿堂并设立了第一个“汉学讲座”的国家,首先创建了亚细亚学会,最早创建了国际汉学刊物《通报》和《亚细亚学报》等,最早在亚洲设立汉学机构(法兰西远东学院以及稍后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日佛会馆等),最早出版大批中国学书籍(17—18世纪)等等。法国在中国学或汉学领域中,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成绩斐然,人才辈出。

究其原因,这大概与法国人自古就注重人文主义的科学与文化有关。世界上只有历史悠久的拉丁文化,才能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媲美,而法国正是拉丁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世界性的中国学研究崛起于17—18世纪,而18世纪也广泛地被人称为“法国世纪”。在欧洲的四大文化圈中,拉丁文化重人文,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重现实,日耳曼文化重语言和思维,斯拉夫文化虽与亚洲文化(特别是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源远流长,却缺乏强大的凝聚力。拉丁文化曾是文艺复兴的动力。法语是拉丁语系的五大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罗马尼亚语)之一。所以,法国完全继承了拉丁文化的这种“历史的持久性”和“对外的开放性”。法国的这种文化传统,再加上其后期拥有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印度支那殖民地,从而奠定了法国在欧洲中国学领域中的遥遥领先的地位。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在对国外中国学的介绍和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重美日英而轻法德的倾向,甚至连俄苏汉学也在中国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冷漠。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国外中国学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精通英日语言的学者人多势众有关。日本中国学家在搜集资料方面出手不凡,但在逻辑推理方面严重不足,故日本学者的著作大都为论文集,专著较少。他们做学问的套路,与中国

老一代学者的方法也有点令人似曾相识之感。美国的中国学家注重为现实服务,并刻意追求“文化利润”,在纯人文科学研究方面略显逊色,这大概与美国的中国学过去很长时间内是在某些政治背景很浓的公司或基金会支持下展开有关。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则偏向于与现实无多大关系的纯人文科学方面,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美文学”(Belles-lettres),包括历史、考古、民族、宗教、哲学、艺术、古典文学、语言、石刻、铭文、书籍版本、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其经济史学家相对稀见。

正是鉴于以上种种原因,译者多年来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全文翻译法国汉学界的原文或原书。多年前,译者翻译的《法国当代中国学》一书,出版后便很快售罄,译者也未能抽时间修订再版。去年,承蒙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晓敏先生和总编办主任秦志华先生的美意,此书被列入该社的出版计划。译者自从结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工作生涯之后,承蒙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盛邀,为该中心做些琐事,而海外中国学学术史又是他们团队的研究重点。既然幸运之神“几十年不遇”地降临到了本人头上,译者兴冲冲地在耄耋之年,再次将旧译作了全面修订,又精心地补译了一大批资料,现不揣鄙陋,奉献给学术界。

本书是有关法国中国学界各位大师对于各位大家、各个时代、各个学科和各个机构的研究的概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中的每一篇短文,都代表着一个庞杂的学科。翻译这样的书,集一人之力,以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是很难胜任的。更何况,译者本人也并非史学专业出身,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法语中有一句成语,叫作“traduire, c'est trahir”,翻译成中文即“翻译就是背叛”。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迥异的人,要准确地翻译他方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精尖成果,实属不易,故本译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实在所难免。

本人再次向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朱政惠主任及其整个团队,表示衷心感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也获得了各方面的大力协助,李丽坤女士帮助本人将全稿输入电脑,于此一并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耿昇

2008年5月底于陋室

1998 年版译序

《法国当代中国学》一书,经过多年酝酿和筹备,在各方面仁人志士的鼎力协助下,终于可以奉献在诸位热情读者的案头了。这一者可以飨中国学术界,二者可以实现法国汉学家朋友们希望让中国同行了解其科研成果的夙愿,三者也是译者这十多年来工作的一次小结。三全其美,人生难得之幸事也!欣慰之余,不禁还想在这部本来已冗长的译著之外,再赘言几句。

西方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已具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西方汉学的兴起,既是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向海外实行殖民扩张和寻找海外市场政策的直接结果,同时它又是多方位地为这一政策服务。换言之,西方国家中于 16 世纪之后兴起的三大东方学(中国学、印度学、亚述学),与殖民主义的崛起和发展是同步的。就中国学而言,它首先在当时南欧的几个航海大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应运而生,但很快就由法国人执西方中国学研究之牛耳了。在美日两强于本世纪后来者居上之前,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始终独领风骚。

18、19 世纪之后,巴黎被誉为“西方汉学之都”。在西方甚至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其实,追根溯源,日本的中国学最早也是受法国的影响和启发才发轫的。美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也有不少是受法国影响,或者是直接由法国人培养出来的,或者是凭借其政治和经济实力诱惑而去的。严格地说,19 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汉学,主要是三个方面:纪实性著作(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译注中国经典和著作(以四书、五经、史地和自然科学著作为主)、宏观介绍中国概况(或为殖民主义的经济、外交、政治、军事服务,或作为贵夫人们沙龙中高谈阔论的新鲜话题),尚谈不到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

西方真正经院式的中国学研究,应该是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于 1814 年 12 月 11 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

学”讲座(实际上是于 1815 年 1 月 16 日开课)而开始的。英国于 1876 年、荷兰于 1875 年、俄国于 1851 年、德国于 1912 年,才使中国学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由此可见,法国在海外中国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成果浸透着严谨的法兰西人文主义精神,尤其是在法国中国学家的考据派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而易见。这大概与整个拉丁语世界重视人文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有关。时至今日,虽然法国的中国学已不再有过去那种独霸一方和称雄于世的局面了,甚至还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法国的中国学家们,其人文科学研究与盎格鲁-撒克逊派仍截然不同。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至今仍然独树一帜,始终令全世界中国学界对之情有独钟,高度重视。

“二战”之后,由于美、日两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学术界懂英、日语者较多,读法、德语者稀少,所以在中国学术界每当谈起海外中国学研究时,言必称美、日、英,能对法、德等国的中国学讲出个子丑寅卯的人,实在寥若晨星。要使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有一种全面的了解和正确评价,必须打破这种日美称霸的局面。

1994 年,当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URA1063)主任、与译者交往多年关系甚笃的老朋友戴仁(Jean-Pierre Drège, 1946—)先生来华访问时,我们突发奇想,欲向中国学术界宏观性地介绍法国自二战之后或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虽然我们将选题范围严格限定在“中国学研究”的范畴内,但面对这样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非但一个或几个中国学者难以胜任,甚至也不是几个法国中国学家力所能及的。我们于是便决定,邀请法国各学科、各单位的主要中国学家介绍各自学科与单位的中国学研究概况。当然,这样分割一个科学整体并不能令人满意,分兵把口,文章分得太细,一个一个领域,难免会产生一种支离破碎之感,而且又会造成重复、交叉和遗漏,甚至还会令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印象,容易使人只看到表面现象而难以揭示内在联系。这实在有点差强人意。但是,“有”对于“无”来说,却永远是“无限大”(∞)。我们情愿将最成熟的果实留给未来更称职的专家们去摘取。我们本来就只抱有充当未来科学发展之铺路石的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已经不容易了。

戴仁教授归国后,便在繁忙的科研、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为这项计划四处奔走,游说“诸子百家”。当译者于 1994 年访法时,我们又共同遍访巴黎中国学家中

的名流。这些老朋友们也出于友情,纷纷将自己的“名山事业”暂作搁置,以大手笔而著小文章。这样又经过两年多,才促成了今天奉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但名家又有名家的难处。由于我们邀请的都是各学科和各单位代表人物或最大权威,所以他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应在自己妙笔之下的生花文章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历来都以谦虚谨慎为美德的学子,唯恐造成“自我吹嘘”之嫌,不以自诩为美,由此造成了对每个学科担纲人物的介绍明显不足。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此外,由于许多内容均属交叉学科,故重复与交叉之处又频频出现,甚至挂一漏万之处也屡见不鲜。每位学者都是根据本学科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命笔,造成了体例很不统一,甚至出现了对同一个问题的评价竟大相径庭。这些都是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学术问题上本来就不能强求一致。本书倒成了西洋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典型之作了,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由于本书从筹备到出版,拖了四年多。法国学者们的约稿拖拖拉拉地陆续看齐,再加上缓慢的翻译、校对工作,故待到本书面世,许多信息资料已经成为历史,最新成果难以反映。不过,就我国学术和出版界的基本状况来看,甚至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任何信息、动态、资料、观点、方法都是“历史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略显过时的。因为已形成的一切,均属于历史,充其量也主要是对过去的总结而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不过,本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总结法国五十年来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全书旨在评说“当代”,而无意于指点“当前”。这样想来,我们反而感到有点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

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均是由戴仁先生在法国组织的未刊专稿,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为了力求更加全面一些,译者又精心选择了几篇过去发表在法国各种学术刊物中的文章。由于个别选题的约稿未到,而在本文集中又绝不能付诸阙如,译者也只好越俎代庖,根据自己掌握的素材而草成“急就章”。特此说明。

本书的选题范围严格地限制在“中国学研究”的范畴内。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各抒己见。但凡是有意或无意攻击中国、搞政治宣传煽动、“冷战”性的书报文章,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机构和刊物,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者,一概与本书绝对绝缘,我们理所当然地应“鄙而远之”。对于法国出版的大量有关中国的通俗读物、纯文学作品、时事评论、影视节目、旅行导游、风景画册一类的著作,也概不予论及。本文集中所介绍的,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科领域。

每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但每种民族文化,也都是

全世界人类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会为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如它必然会从世界各种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文化能否生存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能继续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吸收一切有益的外来营养。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但历代炎黄子孙孜孜不倦地钻研,也吸引了外国学者。从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史,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我们组织翻译这本文集的指导思想。

文化固然具有阶级性,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却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得更加强烈。中西文化间有撞击又有借鉴,有交流又有较量。我们经常听人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根本不了解,我们之间无法沟通和交流”,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聋子的对话”等。此话虽非空穴来风,却有很大偏颇。我们不妨来一个换位思考,换一个角度来辨证同一命题。要想互相沟通、交流和借鉴,首先必须互相理解。在我们责备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精髓到底又熟悉多少。不必过分苛求,如果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达到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熟知程度,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流、借鉴,甚至是较量,也就会容易得多了。我们应该承认,尽管西方那些真正的中国学家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立场和世界观与我们不大相同,但他们大都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高度仰慕。他们为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了向世界介绍古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采取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奉献了毕生精力。其精神可嘉,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讲,唯有他们才是西方真正从深层次上了解中国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必要像商贾大亨们那样重利轻义,也不必像政界权贵们那样“打政治牌”。从宏观上讲,他们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又是中国学者们的异国“知音”或“知己”。所以我们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介绍他们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借“国外中国学”的他山之石,来补国内的“国学”之玉。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月亮也并不比外国的圆。“月是故乡圆”只是一种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而不是科学的事实。这一点大概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中外学者各有千秋,互有短长。科学无国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只能以水平高低来打分,而不应以国籍来划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学根植于华夏这块沃土,但其鲜花与果实却飘香于世界五大洲。我们应为中国学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也应对外国同行的成就表示衷心祝贺。这就是我们从事国外

中国学研究的书生以文会友的“雄心壮志”了。

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汉学”(Sinologie)、“中国学”与“中国研究”(Etudes Chinoises)之间的异同。“汉学”只把中国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之内,“中国研究”又侧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将中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都纳入到“中国学”中,可能较为恰当。法国学者对于蒙古、新疆、西藏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学研究中都占有很大分量,故斟酌再三,本书的标题仍定为《法国当代中国学》。但在法国学者们各自的文章中,涉及中国中原地区和汉民族时,都称之为“汉学”,我们也姑且从之;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我们仍称之为“中国学”。无论如何,若将“蒙古学”、“藏学”、“突厥学”、“满学”等均称为“汉学”,总觉得有一点词不达意。但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很久,也很激烈,大概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本书无意下定论。遵从习惯,约定俗成,这样处理尚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汉学”只是“中国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学”又是“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

我还必须对本书的法国主编戴仁先生作一番简单介绍。戴仁(Jean-Pierre Drège, 1946—)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挂帅人物。他的博士论文《1897—1949年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由法兰西学院研究所出版,作为该所一套博士论文丛书《汉学研究所丛书》第五卷刊行。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96年出版了中译本。他原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继苏远鸣(Michel Soymié, 1924—2003)之后,出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历史和语文学系)的研究导师;又继梅弘理(Paul Magnin, 1939—)之后,担任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共同组成的敦煌文献联合研究组的主任(该研究组现已更名为“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简称URA1063研究组)。他同时还与法兰西学院的魏丕信(Pireer-Etienne Will, 1944—)教授共同担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所长。戴仁先生本人是研究敦煌写本的专家,尤以对中国古代书籍史(印刷术、纸张、文字、装帧等)的研究为专长。他于1991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中国写本时代(10世纪之前)的图书》,于1986年主编了《远东和南亚的书籍与印刷术》的文集。此外,他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书。如《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巴黎,艺术文库出版社1986年版)、《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台湾出版了中译本)等。至于他有关敦煌学,特别是有关中国印刷术史的著作,已不下数十种。戴仁先生是译者的老朋友了,译者翻译过他的不少论文,也写文章介绍过他的学术成果。他经常来华作学术考察与交流。法国

汉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由他主持的。

本书是在多方面的帮助下艰难问世的。那些慷慨赐稿的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们确实情义可嘉。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给了一笔为数不大的出版补贴。虽无济于事,也可略补本书的巨资投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和责任编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媛女士无私奉献,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仔细审读译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所长以及刘梦溪、阎纯德等师友,均曾给予大力帮助。译者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从事法国汉学的翻译和介绍已有十七八个年头了,本书也是对译者这段时间工作的一项小结。本人从来以科学的态度行事,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别人的褒贬。学海泛舟,书山攀崖,有几个热心同行盯着自己,免得溺水坠崖,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

耿昇识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夜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序 言

欧洲的汉学研究实际上发轫于从 16 世纪末起派遣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但只是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法国才出现了一种大学的教学课程。

1814 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一个“中国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创立于 1795 年的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于 1843 年开设中文课程,以为翻译人员作职业准备。稍后数年,便创建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它相继设立了两个系,其中列入了高水平的教学。首先涉及了历史学与语文学,其后是宗教学。1901 年,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创建,使法国汉学家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当代中国文化了。诸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这样的天才人物,便是其明显的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无疑标志着汉学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我们一方面会发现中国研究不仅在欧美数国中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而且投入汉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数目也大量增加。我们尤其是看到了研究领域的一种分裂和大部分汉学家更加明显的专业化现象。更明显地运用各个领域的专业化方法,诸如在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史或科学史等领域中,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在法国,我们应该指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保障了一次惹人注目的过渡,同时表现出他在自己探讨过的大部分领域中的才干,尤其是在佛教和俗学文(话本)领域,同时又向最为错综复杂的研究开放。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步其后尘,他也以一种全新的思想,致力于把综合著作深入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不时地觉得,必须对有关中国的研究作一番总结了。法国汉学研究的这类总结已由人作过数次介绍了——从论述了法国汉学草创时期的考狄(Henri Cordier)和戴密微,直到苏远鸣(Michel Soymié)先生。本书与这些研究不同,它主要涉及近五十年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它不是出自唯一一位作家的作品,而是出

自所论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的著作。

把汉学分割成不同学科,实际是既展现了某些长处,又具有某些弊端。如果说它可以使人更广泛地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内行介绍的各种著作,但它却暴露出了遗忘或重复某些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危险。这可能就是人类学研究的遭遇,该学科的著作就跨越着诸如考古学、经济社会史或技术史等多个领域。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我们认为最好是由一种对于法国汉学主要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简短介绍来补充主题阐述。在此问题上也是一样,无法介绍所有机构。除了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之外,我们仅限于介绍纯粹是从事科研教学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本书中未提到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如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大学、波尔多大学或里昂大学。但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大家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大学之完整名录〔1〕。

这部著作是以对哺育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几个大型文献资料库的介绍而告结束的。无论是大学还是专题科研机构都一样,其中都会出现许多阙如,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社团或者是藏学研究方面更是如此。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主编选择的原因,数篇约稿却令人遗憾地未能按时交付。无论如何,本书必然会提供在法国完成的汉学研究及其丰富内容的一种概观。我特别要感谢本书所辑录文章的作者,他们都友好地完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我也要感谢负责出版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及负责翻译全部文章的耿昇先生(郭丽英和林富士的文章部分是用中文写成的)。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写本、

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URA1063)主任

戴 仁

(Jean-Pierre Drège)

1996年10月于巴黎

〔1〕 请参阅阮桂雅:《法国大学、科研中心和研究组年鉴,1991—1992》,载《法国文化交流会通讯》,1991年12月;裴天士:《法国的汉学、喜马拉雅学、蒙古学和藏学研究》,载《研究札记与文献》第4卷,当代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1992年版。

目 录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译者的话	耿 昇	1
1998 年版译序	耿 昇	4
序言	[法] 戴 仁	10

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史

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	[法] 若瑟·佛莱什	3
法国汉学研究史	[法] 戴密微	74
法国汉学五十年(1923—1973)	[法] 苏远鸣	123

法国历史上的中国学家

沙畹与法国汉学研究的新时代	[法] 马伯乐	155
法国的超级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	[法] 路易·勒努	164
法国卓越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法] 戴密微	178
马伯乐与法国的汉学研究	[法] 戴密微	191
游弋于多领域中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	[法] 谢和耐等	207
法国的百科全书式汉学家考狄	[法] 伯希和	227
法国著作等身的东方学家格鲁塞	[法] 戴密微	236
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	[法] 谢和耐	239